

# 班级环境如何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 健康环境悖论及其发生机制\*

刘晓薇<sup>1</sup> 潘斌<sup>1</sup> 李腾飞<sup>1</sup> 张文新<sup>1</sup> Christina Salmivalli<sup>1,2</sup>

(1.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2. 芬兰图尔库大学, 图尔库 20023)

**摘要:**“健康环境悖论”是指在受欺负水平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受欺负个体有更多的适应问题。通过梳理相关实证研究,本文从人际与认知两大方面分析健康环境悖论的发生机制。人际机制强调健康环境会影响同伴群体对于受欺负者的态度和受欺负者的友谊,这些不良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加剧受欺负者的适应困难。认知机制认为健康环境会通过向上的社会比较和消极归因方式,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问题。最后,我们讨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健康环境悖论”的适用性问题、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对于干预实践的建议。

**关键词:** 受欺负; 班级环境; 健康环境悖论

**分类号:** B844

欺负是指力量较强的一方故意(或恶意)伤害力量较弱的一方的行为(Smith, 1991)。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36%的儿童青少年会遭受其他同伴的欺负(Modecki et al., 2014)。欺负事件会对欺负者、受欺负者当前和未来的心理社会适应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导致个体产生焦虑、抑郁等一系列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Leadbeater et al., 2014; Schwartz et al., 2015; Troop-Gordon, 2017)。鉴于欺负事件较高的发生率和巨大的危害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挪威、瑞典、英国、芬兰、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开展了本国的反欺负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干预效果,欺负和受欺负的发生率显著降低,班级中的反欺负态度逐渐形成,班级环境日益改善(元分析见Gaffney et al., 2019)。然而,欺负干预积极效应并未惠及全部学生,特别是那些干预后仍然遭受欺负的个体(Garandea et al., 2018; Huitsing et al., 2019)。近年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欺负、受欺负发生率较低的班级中,受欺负者有更多适应问题(Garandea et al., 2018; Huitsing et al., 2019)。研究者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健康环境悖论”(Huitsing et al., 2019; Salmivalli, 2018)。为了深入理解健康环境悖论这一现象,本文首先综述班级、学校环境影响受欺负经历与个体适应关联的相关实证文献,然后探讨健康环境悖论及其发生机制,最后结合

中国文化背景探讨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欺负干预的建议。

## 1 健康环境悖论

欺负事件是一个群体过程(Salmivalli, 2010)。个体所处的同伴群体特征影响欺负事件的发生、维持,还会影响欺负事件所产生的结果。学校和班级是儿童青少年同伴交往的主要场所,学校和班级中的同伴互动亦会对欺负、受欺负产生重要影响(Saarento et al., 2015; Saarento & Salmivalli, 2015)。“健康环境悖论”所关注的正是学校、班级环境如何影响受欺负经历和学生适应结果间的关系。所谓“健康”环境,是指欺负、受欺负发生率较低的环境。既有研究中所采用的健康环境指标包括:较低的班级(或学校)欺负、受欺负水平(班级内所有个体欺负、受欺负水平的平均值)(Bellmore et al., 2004; Huitsing et al., 2012)、较低的欺负、受欺负发生率(Garandea et al., 2018)、成功实施欺负干预项目(Huitsing et al., 2019)等。尽管欺负发生率较低的健康环境理应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但是现实却与此相悖,健康环境下受欺负的经历可能导致个体出现更多的适应问题(如图1所示)(Bellmore et al., 2004; Garandea et al., 2018; Huitsing et al., 2019; Huitsing et al., 2012)。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7JZD058)。

通讯作者:张文新, E-mail: zhangwenxin@sd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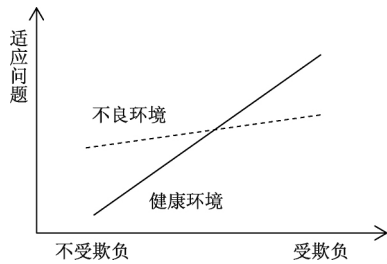


图1 “健康环境悖论”示意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为健康环境悖论提供了支持。其一,健康环境会影响受欺负者的人际关系。Sentse 等人(2007)在对 2578 名学生的研究中发现,欺负发生率较低的班级中,受欺负经历与低同伴接纳间的关联更强。其二,在健康环境下遭受欺负的学生更容易表露出较低自我评价。在受欺负水平较低和成功实施欺负干预项目的班级中,受欺负与自尊的负向关联更强(Huitsing et al., 2012; Huitsing et al., 2019)。Morrow 等人(2019)亦发现在整体攻击水平较低的班级中,日常受言语欺负的经历会导致较低社交自我概念,而在整体攻击水平较高的班级中,受言语欺负的经历与低社交自我概念无显著关联。其三,健康环境会加重受欺负者的不良的情绪适应和躯体化症状等内化问题。横断研究显示,在受欺负总体水平较低班级中,受欺负经历与焦虑、抑郁和躯体化症状关联更强(Bellmore et al., 2004; Gini et al., 2020; Huitsing et al., 2012)。Nishina 和 Juvonen(2005)发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见过或听过较多欺负事件能缓冲受欺负经历对其消极情绪的影响。纵向研究亦发现,在成功实施反欺负项目的学校或受欺负发生率降低的班级中,持续受欺负的个体更有可能产生较多焦虑、抑郁症状(Garandean et al., 2018; Huisting et al., 2018)。

## 2 健康环境悖论的理论机制

健康环境如何影响受欺负者适应的呢?据我们所知,尚未有实证研究直接检验健康环境悖论的发生机制。但近期的相关实证研究为健康环境悖论的发生机制提供了一些可能解释(Schacter & Juvonen, 2015; Sentse et al., 2007)。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总结,我们认为健康环境悖论的理论机制包括公平世界信念、个体-群体不匹配模型、默认选择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和归因理论,其中公平世界信念、个体-群体不匹配模型和默认选择理论主要从受欺负者人际关系的视角阐释健

康环境悖论的发生机制,而社会比较理论和归因理论主要关注了受欺负者对于自身和所处环境的认知过程。

### 2.1 健康环境悖论的人际机制

健康环境带来的消极结果之一是影响受欺负者的人际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健康环境影响了同伴群体对于受欺负者的态度。首先,当班级中仅存在少数受欺负者时,同伴群体会倾向于认为这些儿童的受欺负是罪有应得的,因而会产生对受欺负者的消极态度。人们普遍持有“公平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的认识偏差,认为人们得其所应得,换言之,人们会倾向于相信“好有好报,恶有恶报”(Lerner, 1970)。这种对于受欺负者“恶有恶报”的认知偏差在受欺负发生率较低的班级中尤为突出,在这种环境下,同伴群体会将欺负事件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受欺负者,指责受欺负者的缺点,产生对受欺负者的消极态度和评价。其次,根据个体-群体不匹配模型(Wright et al., 1986),同伴群体对于个体行为的态度取决于其所处同伴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当个体行为与同伴群体的行为模式不一致时,个体可能被视为“另类”,遭受同伴拒绝。在健康的环境中,受欺负事件的发生率相对较低,个体遭受欺负的经历是一种非“常态化”现象,与班级环境中受欺负发生率较低的现状格格不入,因此受欺负者难以被同伴接纳(Sentse et al., 2007)。与公平世界信念、个体-群体不匹配模型相一致,健康环境对于受欺负者人际关系的消极影响得到了 Sentse 等人(2007)研究的支持。

健康环境还可能会影响受欺负者的友谊。默认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受欺负者不被主流同伴群体接纳,他们不得不寻求其他同样受欺负个体的友谊(Sentse et al., 2013; Sijtsema et al., 2013)。但是,健康的环境下,同样受欺负个体的数量相对较少,因而受欺负者与同样受欺负的同伴成为朋友的机会也相对较少。因此,相比不良环境,健康环境下受欺负者更难与其他同伴建立友谊。缺少朋友使得受欺负者在遭受欺负时无法得到朋友的保护(Huitsing et al., 2014; 任萍等, 2018),遭受欺负后也不能得到朋友的陪伴、安慰和支持(Schmidt & Bagwell, 2007)。此外,缺失同样受欺负的朋友造成受欺负个体无法与其他同伴一起“分享困境”,难以缓解受欺负带来情绪问题(Brendgen et al., 2013; Schacter & Juvonen, 2019)。综上,健康环境会加剧受欺负者不良的同伴关系,这可能是健康环境影响受欺负

者适应问题的机制之一。

## 2.2 健康环境悖论的认知机制

从个体认知的角度来看,健康环境会通过影响受欺负者社会比较的过程,进而影响其对自身价值和能力的评估以及对欺负事件的归因方式。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会倾向于对自身与他人的经历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会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评估及其情绪状态(Gerber et al., 2018)。当面临不利处境时,个体会通过与同样处于不利处境的个体进行比较(即向下的社会比较)来维持自尊(Wills, 1981),而当个体与处境较好的个体进行比较时(即向上的社会比较),个体会体验到更多低自我价值感、无能感和消极情绪(Gibbons, 1986)。在健康环境中,班级中同样受欺负的个体数量较少,受欺负者缺乏适宜的比较对象,他们只能与其他未受欺负者进行社会比较,这会导致他们体验到较低的自尊、消极的自我概念和较多的情绪问题。相反,如果班级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受欺负者,则有可能缓冲受欺负带来的消极影响。与社会比较理论理论的预期相一致,研究发现身处较低的受欺负水平环境的受欺负者会出现更多消极的自我认识(Huitsing et al., 2012; Huitsing et al., 2019; Morrow et al., 2018)。

此外,健康环境还会影响受欺负者对于欺负事件的归因方式。根据 Weiner(1986)的归因理论,在面对欺负事件时,受欺负者会从三个维度解释受到欺负的原因:因素源(受欺负的原因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可控性(受欺负者能否改变自身受欺负的现状)和稳定性(受欺负的情况是否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Schacter 和 Juvonen(2015)以 26 所学校 5991 名六年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学校中平均受欺负水平会影响学生对欺负事件的归因方式。具体而言,处于平均受欺负水平较低的学校中,受欺负者会倾向于进行特质的自责归因(characterological self-blame),即认为受欺负是由他们自身特质因素导致的(内归因),相信现状难以改变(不可控的),并且认为自己会一直受到欺负(稳定的)(如“受欺负是由我性格的原因造成的”);相反,处于平均受欺负水平较高的学校中,他们会倾向于对欺负事件做出行为的自责归因(behavioral self-blame),认为受欺负是由他们自身行为因素导致的(内归因),但他们相信通过自身努力,现状可以改变(可控的),自己不会一直受到欺负(暂时的)(如“我受欺负是因为在错误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两种不同的归因方式亦会产生不同的适应

结果。特质的自责归因不仅会直接引发个体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Graham et al., 2009; Graham & Juvonen, 1998),还可能会加重受欺负经历与其他内化问题间的关联(Perren et al., 2013);而进行行为的自责归因时,由于个体认为导致受欺负的原因是可控的、暂时性的,因而这种归因方式不会导致更多的不良适应结果(Graham & Juvonen, 1998)。

## 3 健康环境悖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目前为止,有关该理论的实证研究均使用了西方样本,健康环境悖论是否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适用还需进一步探讨。我们尝试基于中国文化特征对健康环境悖论在中国文化下的适用性进行讨论。受集体主义文化特征和儒家思想影响,中国文化重视人际和谐、服从权威,强调对集体规范的遵从(Ji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17)。这些文化特征与健康环境悖论的发生机制密切相关。其一,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要求个体与所属群体拥有更高的一致性,因而更容易形成一致的集体规范。这种集体规范包含被动强制的内涵,可能会导致处于健康环境下的受欺负者遭受来自全班的社会排斥(Smith et al., 2016; Smith & Robinson, 2019)。这会导致受欺负者更难结交朋友,产生更多适应问题。其二,由于集体主义文化更加强调群体依赖,中国儿童青少年更加倾向于以他人作为标准评价自身(Wang, 2004)。因此,在缺少同样受欺负的同伴作为社会比较的对象时,中国儿童青少年更可能会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和更多的自责归因,导致更多消极影响。基于以上考虑,中国文化背景下可能同样存在健康环境悖论的现象,该现象甚至会更加凸显。然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强调“仁爱”与人际间的和谐,因此中国儿童青少年更加同情受欺负者的遭遇,也更加愿意对受欺负者出手相助(纪林芹等, 2003)。也就是说,中国儿童青少年对受欺负者可能持有更加积极的态度,这有助于缓解健康环境对于受欺负者的消极影响。尽管我们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健康环境悖论现象做出了讨论,但是健康环境悖论的适用性仍有待中国样本的实证研究的验证。

## 4 未来研究展望和对校园欺负干预的启示

### 4.1 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既有研究对健康环境悖论的理解不断加

深,但研究中仍存在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首先,健康环境悖论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既有研究为健康环境悖论的发生机制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仍有待进一步的统计检验。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借助一些复杂的统计模型(如带中介的调节模型)进一步检验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归因方式等因素的作用,为健康环境悖论理论机制提供更加直接和确切的实证证据。

其次,更多健康环境指标对受欺负者适应的影响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较低的受欺负水平、欺负的发生率下降这些客观的健康环境因素对于受欺负者情绪适应的影响,但是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健康环境指标,如群体成员的反欺负态度(包括对欺负事件的反对态度、对受欺负者的同情和支持意愿等)。在反欺负态度较为积极的班级中,受欺负者可能感受到更多来自同学的关怀和支持,从而缓冲受欺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Pozzoli et al., 2012)。因而,班级成员的反欺负态度可能会缓冲受欺负经历与消极情绪适应的关联。

再次,未来研究需要考察健康环境对于受欺负者其他适应结果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健康环境对于受欺负者人际关系、自我评价、情绪问题的影响,而对于受欺负者外化问题的影响却知之甚少。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在不良的环境下个体会经常目睹他人受到欺负,他们会将攻击、欺负行为视为一种常态化行为。受欺负者可能会模仿欺负者的行为,破坏纪律,对他人实施攻击,以缓解自身的消极情绪(Brendgen et al., 2013)。因此,与健康环境对内化问题的影响不同,健康环境可能会缓解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影响。当然,这一推论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最后,健康环境悖论可能不仅体现在班级环境对受欺负者适应的影响中,还可能会体现在对于旁观者行为的影响中。Peets 等人(2015)发现,在平均欺负水平较高的班级中,共情能力较高的儿童更倾向于保护受欺负者,而在平均欺负水平较低的班级中,共情能力与保护行为无显著关联。这一结果意味着,在健康的环境下,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反而更加不愿意保护受欺负者。这一有趣现象及其背后的发生机制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的挖掘。

#### 4.2 对未来校园欺负干预的启示

由于欺负事件是一种群体过程,因此从学校层面介入实施普遍干预,通过改变欺负发生的环境,增

强旁观者的保护行为,可以有效降低欺负的发生率,使大多数学生从中获益(Kärnä et al., 2011; Williford et al., 2012)。然而,降低欺负的发生率并非欺负干预唯一追求的目标。健康环境悖论的结果表明,较低的欺负发生率反而会导致持续受欺负者更有可能产生适应问题。这对我们欺负的干预有两点启示:其一,即使学校氛围良好、欺负发生率相对较低,欺负的干预工作也不容忽视,因为在其中的少数受欺负者受到了更多的消极影响;其二,在实施欺负干预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针对全体学生的普遍性预防,降低欺负事件发生率,还要特别注重针对受欺负者的心理干预,着力缓解受欺负个体的适应问题。通过两种策略的有机结合,同时实现班级环境的改善和受欺负者适应的改善两个目标。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帮助持续受欺负者。一方面,在干预效果的评估过程中,不仅应关注欺负的总体发生率变化,还应注意受欺负者在其所处班级中的境况(Brendgen et al., 2013),重点筛查那些经过干预后仍受欺负的个体。另一方面,在干预的实施过程中,要采取措施帮助受欺负者,改善他们的适应状况。首先,根据健康环境悖论的人际机制,在针对全体学生的普遍性干预中,教师可通过班会、共同讨论等方式使全班学生理解到个体在遭受欺负后的痛苦与无助,使之产生对受欺负者遭遇的共情,从而改变他们对于受欺负者的消极态度,进而引发他们帮助受欺负者的意愿。其次,鉴于朋友对于受欺负者情绪适应的重要作用,在欺负事件发生后的心理干预中,教师可通过组建支持小组来增加受欺负个体的朋友支持(van der Ploeg et al., 2016)。为保证支持小组的效果,支持小组应包含亲社会的、班级地位较高的个体,他们可以在欺负事件中充当“保护者”角色(van der Ploeg et al., 2016; 任萍等, 2018);还应包含曾经有过受欺负经历的个体,这些个体能与仍受欺负者“共享困境”,降低其不良的适应。最后,根据健康环境悖论的认知机制,教师在对学生实施定向干预时,需要引导学生进行适宜的社会比较,形成对欺负事件恰当的归因。为引导受欺负者做出适宜的社会比较,教师可以告知受欺负者其他人的受欺负经历,从而使受欺负者认识到有很多人和他面临着同样的困境(Garandeanu et al., 2018)。从归因的角度来看,教师应示范积极的归因方式(Perren et al., 2013),帮助学生认识到受欺负并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错误引起的,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

## 5 结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为“健康环境悖论”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这些研究发现,处于诸如较低的受欺负水平、实施反欺负干预项目、欺负的发生率下降等健康环境下,受欺负经历有可能引发个体更严重的适应问题(Bellmore et al., 2004; Garandeau et al., 2018; Huitsing et al., 2019; Huitsing et al., 2012; Nishina & Juvonen, 2005)。综合已有文献,研究者从“人际”和“认知”两个方面解释了健康环境悖论的发生机制。健康环境悖论的人际机制认为,健康环境会通过影响同伴群体对受欺负者态度和受欺负者的友谊,导致受欺负者更多的适应问题。而健康环境悖论的认知机制认为,健康环境会通过影响受欺负者的自我评价和归因方式,进而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问题。未来的干预实践中,需要加强对持续受欺负者的筛查,并从受欺负者的人际关系和认知过程两方面着手,对受欺负者实施心理干预。

### 参考文献:

- Bellmore, A. D., Witkow, M. R., Graham, S., & Juvonen, J. (2004). Beyond the individual: The impact of ethnic context and classroom behavioral norms on victims' adjust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0*(6), 1159–1172.
- Brendgen, M., Vitaro, F., Barker, E. D., Girard, A., Dionne, G., Tremblay, R. E., & Boivin, M. (2013). Do other people's plights matter? A genetically informed twin study of the role of social context in the link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children's aggression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2), 327–340.
- Gaffney, H., Tofi, M. M., & Farrington, D. P. (2019).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s: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45*, 111–133.
- Garandeau, C. F., Lee, I. A., & Salmivalli, C. (2018). Decreases in the proportion of bullying victims in the classroom: Effects on the adjustment of remaining victi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42*(1), 64–72.
- Gerber, J. P., Wheeler, L., & Suls, J. (2018). A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meta-analysis 60+ years 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4*(2), 177–197.
- Gibbons, F. X. (1986). Social comparison and depression: Company's effect on mise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1), 140–148.
- Gini, G., Holt, M., Pozzoli, T., & Marino, C. (2020). Peer victimization and somatic problems: The role of class victimization levels.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90*(1), 39–46.
- Graham, S., & Juvonen, J. (1998). Self-blame and peer victimization in middle school: An attributional analysi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3), 587–599.
- Graham, S., Bellmore, A., Nishina, A., & Juvonen, J. (2009). "It must be me": Ethnic diversity and attributions for peer victimization in middle school.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8*(4), 487–499.
- Huitsing, G., Lodder, G. M. A., Oldenburg, B., Schacter, H. L., Salmivalli, C., & Juvonen, J. (2019). The healthy context paradox: victims' adjustment during an anti-bullying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9), 2499–2509.
- Huitsing, G., Snijders, T. A., Van Duijn, M. A., & Veenstra, R. (2014). Victims, bullies, and their defender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coevolu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network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6*(3), 645–659.
- Huitsing, G., Veenstra, R., Sainio, M., & Salmivalli, C. (2012). "It must be me" or "It could be them?":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network position of bullies and victims on victims' adjustment. *Social Networks, 34*(4), 379–386.
- Ji, L., Pan, B., Zhang, W., Zhang, L., Chen, L., & Deater-Deckard, K. (2018).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eer Relations and Attention Problems from 9 to 16 Year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7*(3), 381–392.
- Kärnä, A., Voeten, M., Little, T. D., Poskiparta, E., Kaljonen, A., & Salmivalli, C. (2011). A large scale evaluation of the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Grades 4–6. *Child Development, 82*(1), 311–330.
- Leadbeater, B. J., Thompson, K., & Sukhawathanakul, P. (2014). It gets better or does it? Peer victimization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to young adulthood.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6*(3), 675–688.
- Lerner, M. J. (1970). The desire for justice and reactions to victims. In J. Macaulay & L. Berkowitz (Eds.), *Altruism and helping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5–229.
- Modecki, K. L., Minchin, J., Harbaugh, A. G., Guerra, N. G., & Runions, K. C. (2014). Bullying prevalence across contexts: A meta-analysis measuring cyber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5*(5), 602–611.
- Morrow, M. T., Hubbard, J. A., & Sharp, M. K. (2019). Preadolescents' daily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competenc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lassroom aggressio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8*(5), 716–727.
- Nishina, A., & Juvonen, J. (2005). Daily reports of witnessing and experiencing peer harassment in middle school. *Child Development, 76*(2), 435–450.
- Peets, K., Pöyhönen, V., Juvonen, J., & Salmivalli, C. (2015). Classroom norms of bullying alter the degree to which children defend in response to their affective empathy and powe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1*(7), 913–920.
- Perren, S., Etekal, I., & Ladd, G. (2013). The impact of peer victimization on later maladjustment: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hostile and self-blaming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4*(1), 46–55.
- Pozzoli, T., Gini, G., & Vieno, A. (2012). The role of individual correlates and class norms in defending and passive bystander behavior in bullying: A multilevel analysis. *Child Development, 83*(6), 1917

- 1931.
- Saarento, S., & Salmivalli, C. (2015). The role of classroom peer ecology and bystanders' responses in bullying.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9(4), 201-205.
- Saarento, S., Garandeau, C. F., & Salmivalli, C. (2015). Classroom and school-level contributions to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A review.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3), 204-218.
- Salmivalli, C. (2010). Bullying and the peer group: A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5(2), 112-120.
- Salmivalli, C. (2018). Peer vic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in young adulthood: Commentary on the special sec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6(1), 67-72.
- Schacter, H. L., & Juvonen, J. (2015). The effects of school-level victimization on self-blame: Evidence for contextualized social cogni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1(6), 841-847.
- Schacter, H. L., & Juvonen, J. (2019). Dynamic changes i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across middle school: Does friends' victimization alleviate distress? *Child Development*, 90(5), 1738-1753.
- Schmidt, M. E., & Bagwell, C. L. (2007). The protective role of friendships in overtly and relationally victimized boys and girl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53(3), 439-460.
- Schwartz, D., Lansford, J. E., Dodge, K. A., Pettit, G. S., & Bates, J. E. (2015). Peer victimization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as a lead indicator of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diagnostic outcomes in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4(3), 393-404.
- Sentse, M., Scholte, R., Salmivalli, C., & Voeten, M. (2007). Person-group dissimilarity in involvement in bullying and its relation with social statu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5(6), 1009-1019.
- Sentse, M., Dijkstra, J. K., Salmivalli, C., & Cillessen, A. H. (2013). The dynamics of friendships and victimization in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 39(3), 229-238.
- Sijtsema, J. J., Rambaran, J. A., & Ojanen, T. J. (2013). Overt and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and adolescent friendships: Selection, de-selec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Social Influence*, 8(2-3), 177-195.
- Smith, P. K. (1991). The silent nightmare: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school peer groups. *The Psychologist*, 4(6), 243-248.
- Smith, P. K., & Robinson, S. (2019). How Does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Relate to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llying Prevention*, 1(1), 3-13.
- Smith, P. K., Kwak, K., Hanif, R., Kanetsuna, T., Mahdavi, J., Lin, S. F., ... Ucanok, Z. (2016). Linguistic issues in studying bullying-related phenomena: Data from a revised cartoon task. In P. Smith, K. Kwak, & Y. Toda (Eds.), *School bullying in different cultures: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0-298.
- Troop-Gordon, W. (2017). Peer victimization in adolescence: The nature, progression, and consequences of being bullied within a developmental contex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55, 116-128.
- van der Ploeg, R., Steglich, C., & Veenstra, R. (2016). The support group approach in the Dutch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me: Effects on victimisation, defending and well-being at school. *Educational Research*, 58(3), 221-236.
- Wang, Q. (2004).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elf-construct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self-description in European American and Chinese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0(1), 3-15.
- Weiner, B. (1986).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motivation and emo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Williford, A., Boulton, A., Noland, B., Little, T. D., Kärnä, A., & Salmivalli, C. (2012). Effects of the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on adolescents'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erception of peer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0(2), 289-300.
- Wills, T. A. (1981). Downward comparison principles in so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0(2), 245-271.
- Wright, J. C., Giammarino, M., & Parad, H. W. (1986). Social status in small groups: Individual-group similarity and the social "misfi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3), 523-536.
- Zhang, W., Wei, X., Ji, L., Chen, L., & Deater-Deckard, K. (2017). Reconsidering parenting in Chinese culture: Subtypes,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6(5), 1117-1136.
- 纪林芹, 张文新, Johns, K., Smith, N. (2003). 中国与英国儿童对待欺负问题态度的比较研究. *心理与行为研究*, 1(2), 122-127.
- 任萍, 张云运, 周艳云. (2018). 校园欺负中的积极参与角色: 保护者. *心理科学进展*, 26(1), 98-106.

## How Does Classroom Environment Impact the Victims' Adjustments? Healthy Context Paradox and Its Mechanisms

LIU Xiaowei<sup>1</sup> PAN Bin<sup>1</sup> LI Tengfei<sup>1</sup> ZHANG Wenxin<sup>1</sup> Christina Salmivalli<sup>1, 2</sup>

(1.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Turku, Turku 20023)

**Abstract:** The “*Healthy Context Paradox*” is defined as the phenomenon that victims are more likely to be maladjusted in “healthy” contexts, such as classrooms where level of victimization is relatively low, where the proportion of victims had decreased over time and where an anti-bullying program was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there are two possible mechanisms explaining for this phenomenon, i. e., the interpersonal process and the cognitive process hypotheses. The interpersonal mechanism highlights that healthy context might cause peers' more negative evaluation towards the victims and reduce victims' friendship opportunities, and such maladap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urn worsen victims' adjustment.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posits that healthy contex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victims' maladjustment through influencing on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passive attribution style. Finally, we discussed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healthy context paradox in Chinese culture context, pointed out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propose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bullying victimization; classroom context; healthy context paradox